

诸子百家和国际政治

□徐兴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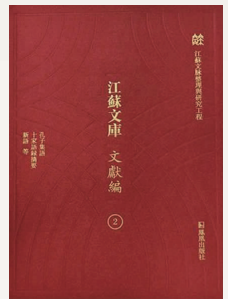
徐兴无
书 | 话 | 文 | 脉

导读

先秦诸子的时代既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创发时代,也是一个变革剧烈的国际化时代,思想家们对天下的政治和外交有着不同的主张,并为近现代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智慧。



江苏文脉·精华编 第29册
《论语正义》
[清]刘宝楠撰 高流水点校
凤凰出版社 2021年



江苏文脉·文献卷·子部
第2册《说苑》
[汉]刘向撰
凤凰出版社 2019年



江苏文脉·精华编 第30册
《孟子正义》
[清]焦循撰 孙德彩点校
凤凰出版社 2018年



江苏文脉大讲坛

1863年,美国长老会传教士、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(W.A.p.Martin, 1827—1916)奉清政府之命译出美国驻欧洲外交官亨利·惠顿(Henry Wheaton, 1785—1848)撰写的《国际法原理》(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),次年定名为《万国公法》刊行(丁韪良《花甲忆记——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》)。这是中国官方出版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。不过中国人也可有自家的国际观。在此之前的1844年,徐继畲(1795—1873,山西五台人)编纂的世界历史地理书籍《瀛环志略》就说“欧罗巴情势,颇类战国”。1866年,徐氏出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,重刻此书。他的朋友张斯桂给中译本《万国公法》作《序》,将中国比作春秋时的周天子,秦、楚、晋、齐诸霸主分别为俄罗斯、英国、法国和美国。这种比附的方法,成为晚清士人思考、分析国际关系时的通行思路与话语模式。比如江苏的几位近代新学代表人物中,冯桂芬(1809—1874,苏州人)《校邠庐抗议》云:“今海外诸夷,一春秋时之列国也。”王韬(1828—1897,苏州人)《弢园文录外编》曰:“欧洲诸国之在今日,其犹春秋时之列国,战国时之七雄也。”薛福成(1838—1894,无锡人)《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》称:“大小相维,强弱相制,联盟相约,莫能相并,今日欧洲之形势,与昔日中国之形势相衡,其犹春秋战国之间乎?”《万国公法》刊行后,清政府终于在1867年(同治六年)向欧美派出了使臣团。

大概受到中国士人的影响,1881年9月,丁韪良在柏林举行的东方学者大会上宣读了论文《中国古世公法论略》,他向欧洲介绍说,中国在秦汉统一之前,也如古希腊一样诸国散处,但他们都遵守天子之法,一如欧洲的中世纪,制度文教皆出自罗马教皇。可惜中国古代的公法没有纂述成书,“今所传者,惟散见于孔孟之书、诸子百家之说,以及稗官野史之所记。而《周礼》一书,犹足以资考证。”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并接受国际法,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有着相似的历史经验与文化观念。这篇文章由当时的同文馆高材生、译书纂修官汪凤藻(1851—1918,苏州人)译成中文刊行。

尽管晚清士人以古喻今,以中况外的国际政治观念是一种解释与宣传的策略,但诸子百家们对国际或天下的政治不乏阐述,至今学界都在研究,因为其中确有值得借鉴之处。

孔子作为诸子时代的开创者,也是第一个周游列国的思想家。春秋时代有一百多个国家,他认为必须共同遵守周礼,反对霸权:“天下有道,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;天下无道,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但是孔子已经生活在一个霸主的时代,礼崩乐坏,周天子已无威信和能力为各国提供保障,国际关系成了大国与小国的争斗,所谓“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”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)。《左传》中说:“小国之事大国也,德,则其人也;不德,则其鹿也。铤而走险,急何能择。”(文公十七年)朝秦暮楚的小国一方面顺从大国以自保,一方面也会自卫反击。如果大国以仁德加于己,就以人道与大国和睦相处,反之则如禽鹿那样履险自萌。因此孔子也很实际,主张大国霸主有责任维持国际间的和平。他肯定管仲和齐桓公的霸业: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“桓公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,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!如其仁!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但他更主张大国扶持弱小国家:“兴灭国,继绝世,举逸民,天下之民归心焉。”(《论语·尧曰》)清人刘宝楠(1791—1855,江苏宝应人)《论语正义》认为“灭国”是指“无罪之国”,西汉刘向认为这是殷高宗武丁思先王之政而采取的措施(《说苑·君道》)。不过孔子对他国发生的暴力政变,也主张国际干预。齐国的陈成子弑简公。“孔子沐浴而朝,告于哀公曰:‘陈恒弑其君,请讨之。’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孔子作《春秋》,其实就是制定国际法,所以孟子说:“《春秋》,天子之事也。”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

战国时代的兼并攻伐更为剧烈,道德与文明也沦丧殆尽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“周末风俗”指出,自《左传》之终(鲁哀公二十七年)至《资治通鉴》之始(周显王三十五年),“凡一百三十三年,史文阙轶”,而文化也发生了巨变。“春秋时犹尊礼重信,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。春秋时犹宗周王,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。”“春秋时犹有告策书,而七国则无有矣。邦无定交,土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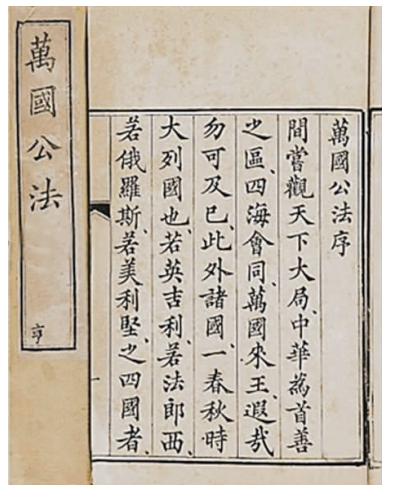
定主。”而这正是平民布衣之士苏秦、张仪之辈的纵横家在外交上大显身手时代。刘向《战国策序》说战国是一个黑暗的时代,“上无天子,下无方伯;力功争强,胜者为右;兵革不休,诈伪并起。当此之时,虽有道德,不得施设。”“故孟子、孙卿儒术之士,弃捐于世,而游说权谋之徒,见贵于俗。是以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、陈轸、(苏)代、(苏)厉之属,生从(纵)横短长之说,左右倾侧。”不过他也欣赏纵横家们平衡外交与止战和平的能力,“天下不交兵者,二十有九年。”“皆高才秀士,度时君之所能行,出奇策异智,转危为安,运亡为存。”

尽管纵横家给中国历史上留下丰富的外交智慧,但多是权衡利害的谋略,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根本法则和价值理想。他们自己也说:“仁义者,自完之道也,非进取之术也。”(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)所以当纵横家景春对孟子夸耀“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谓大丈夫哉?一怒而诸侯惧,安居而天下熄”时,孟子不屑地反驳道:“是焉得为大丈夫乎?”只不过是“以顺为正”的“妾妇之道”罢了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。清人焦循《孟子正义》认为纵横家不能以义匡君,故而孟子斥为妾妇之顺。齐宣王曾经询问孟子外交原则:“交邻国有道乎?”孟子向他揭示了两条:“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”,“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。不久燕国大乱,民望拯救,齐宣王乘机伐燕。他对孟子说:“不取必有天殃,取之何如?”孟子建议“取之而燕民悦,则取之”,“取之而燕民不悦,则勿取”。可是齐宣王并没有吊民伐罪,而是侵夺残民,于是诸侯们联兵救燕。齐宣王又问计于孟子。孟子说:“天下固畏齐之强也,今又倍地(侵占土地)而不行仁政,是动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,反(还)其旄倪(老人与孩子),止其重器(宗庙宝器),谋于燕众,置君而后去之,则犹可及也。”宣王还是听不进去,燕人奋起反击,打败齐军。齐宣王悔道:“吾甚惭于孟子!”而失望的孟子从此离开了齐国(《孟子·公下》)。

道家对人类的文明持消极看法。他们的政治理想是“小国寡民”,“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,不相往来。”(《老子》八十章)。这只能是桃花源里的世界。现实中的老子主张大国小国谦和相处。“大邦者下流,天下之交,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静胜牡,以静为下。故大邦以下小邦,则取小邦;小邦以下大邦,则取大邦。故或下以取,或下而取。大邦不过欲兼畜人,小邦不过欲入事人。夫两者各得所欲,大者宜为下。”(《老子》六十一章)大国要如江河的下游那样才能聚合天下,雌柔静定胜过雄强挑衅。大国谦下就能包容小国,小国谦卑就能依附于大国,各自实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目标,但是大国更应该谦下。

法家主张积极变革进取,强调富国强兵,知晓攻守形势。所谓“凡战法必本于政。”(《商君书·战法》)“四战之国贵守战,负海之国贵攻战。”(《商君书·兵守》),他们的国际原则就是以强兼弱,加快郡县制度的统一进程。与之相反,墨家是激进的和平主义者。他们认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,“今天下无大小国,皆天之邑也。”人类的兼爱互利是天的小意,“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,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。”(《墨子·法仪》)因此,墨家反对一切战争,提出“非攻”的思想;反对大国以任何借口攻打小国,主张国际联合援助弱小国家。“大国之不义也,则同仇之;大国之攻小国也,则同救之。”(《墨子·非攻下》)墨家为反战止战而呼号奔走。“公输般为楚国造云梯之械成,将以攻宋。子墨子闻之,起于齐,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”,与公输般进行了沙盘推演,以工兵的技巧击破了公输般的攻城方略。《墨子》书共七十一篇,其中自《公输》至《杂守》十二篇都是讲守城备战的术的,与《孙子兵法》专攻攻取之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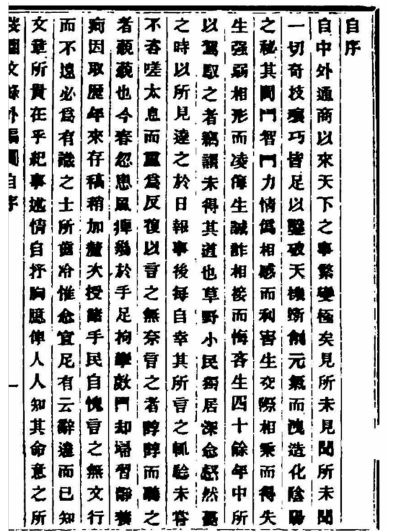
总之,道义、平等、和平、责任、谦让、仁爱、智慧、谋略、进取构成了诸子百家国际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则和价值。当近代中国走向世界之时,这些古老的思想被激发出来,成为重新理解世界的历史文化资源。甲午战败后,中国士人深知一个遵守国际法的积弱之国仍然不能屹立于世界,于是维新变法的领导者如梁启超(1873—1929)提出了中国的国际法:“西人果鲁士西亚,虎哥皆以布衣而著《万国公法》,天下遵之。今孔子之作《春秋》,乃万世公法也。”(《读春秋界说》)“故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,以文明我中国;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。”(《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》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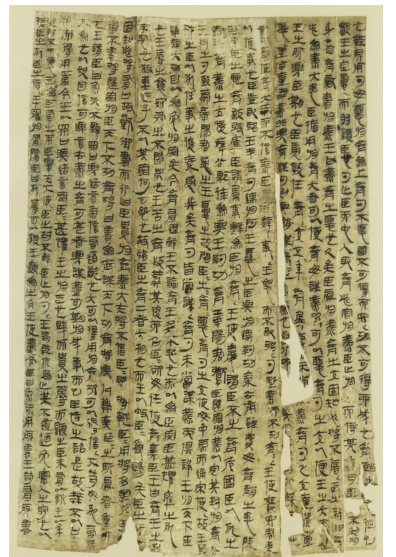
清刊本《万国公法》书影



清光绪十年刻本《校邠庐抗议》书影



清光绪九年刻本《弢园文录外编》



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